

20世纪50年代的凉山彝族社会调查与古史分期争论

王慧颖

【提要】 新中国成立之初,西周社会性质成为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争论的焦点,因各派学者迟迟不能统一意见,解决问题的希望遂被寄托在新史料的出现上。当此之时,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造也有判定社会形态的需要,于是少数民族历史调查逐渐与古史分期讨论出现交叉。20世纪50年代郭沫若与胡庆钧的互动是上述两项研究相互作用的缩影。自郭沫若将胡庆钧的凉山彝族社会研究引入西周社会性质的讨论后,古史分期争论受到凉山彝族社会调查资料的启发,反过来又推动了凉山彝族社会研究的深入与扩大。探讨郭、胡二人之间的互动及其后续发展,既有助于了解古史分期争论在少数民族历史调查材料的支撑下取得的进展,也可捕捉唯物史观和社会形态理论在历史学科之外造成的余响。

【关键词】 古史分期 历史调查 郭沫若 胡庆钧 凉山彝族

20世纪四五十年代,西周社会性质的界定成为古史分期争论的重要问题。因对同一资料解读多歧,所以持“封建论”与“奴隶社会说”者虽均援引大量历史文本和考古发现,但始终各执一是。讨论陷入僵持,正值国内少数民族调查蓬发之际。于是,曾多次以凉山彝族社会补证其说的郭沫若,冀望于胡庆钧的《大凉山彝族社会》这一“活材料”的引入能打破当时的困局。“西周封建论”者曾将西周社会比照古希腊罗马奴隶社会,由此得出西周的井田制、分封制以及有一定人身自由和土田房屋的劳动者,与古希腊罗马社会的特征不符,反而更类似西欧的封建社会。胡氏报告所呈现的凉山彝族社会,在古希腊罗马奴隶社会之外,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现成可供细致观察的奴隶社会标本,这便为郭沫若解决西周社会性质讨论中诸如井田制、分封制的性质以及“农奴”与“奴隶”等纠葛,提供了有力的论据。与此同时,郭沫若对西周奴隶社会的见解,也持续推动着胡庆钧后续的凉山彝族社会调查。在郭沫若、胡庆钧二人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少数民族历史调查材料引入古史分期讨论,推动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既有关于凉山彝族社会调查的研究,多属民族史范畴,或将其视作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民族调查的一个分支,或把它作为凉山地区民主改革进程的组成部分,探讨该调查展开的始末、影响以及有关该地区社会性质争论的情况。^①至于有关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专题研究,则重在阐释有关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分歧意见,审视各派论证之得失,并分析其历史源流与语境。^②总的来说,目前学界

① 如纳日碧力戈等《人类学理论的新格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秦和平《四川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研究——20世纪50年代四川藏区彝区的社会变革》,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等。

② 如林甘泉等《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一九二九——一九七九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罗新慧《20世纪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辩》,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李红岩《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于沛主编《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第4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等等。

较少注意凉山彝族社会调查与古史分期争论的相互作用。^①近年来,由于缺乏新视角与新材料等原因,国内学者对古史分期争论的研究热情显著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对凉山彝族社会调查与古史分期讨论进行同步考察,重新审视二者之间的交互影响,总结其经验得失,有助于深入了解古史分期争论在少数民族调查材料的支撑下所取得的进展,并捕捉唯物史观和社会形态理论在历史学科之外造成的余响。

一、西周社会性质争论与凉山彝族社会研究缘起

西周究属何种社会形态,历来是中国古史分期争论的重要议题。自 1930 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来,郭沫若虽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期几易其说,但不曾动摇关于西周奴隶社会的看法。因为西周社会性质不但事关中国奴隶社会之有无,也牵涉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的界限,所以在郭沫若的分期主张屡屡遭到质疑与挑战之际,西周社会性质也持续引起学界热议。

20 世纪二三十年以来,参与古史分期争论的学者在分析西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各要素时,往往“不是举希腊、罗马的例子,就是罗列殷墟不完整的材料”。其中,持“西周封建论”者将西方古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范例与中国历史文本和考古发现相结合,将西周的井田制、分封制认定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并把有一定私产和人身自由的生产者视为农奴,借此对“西周奴隶社会”说提出质疑。^②对此,郭沫若虽一一反驳,但难以在有限的史料中找到压倒性证据。于是,他将凉山彝族社会研究与“黑劳工”“人殉”一并引入讨论,在论述中国奴隶社会过程中,不以古希腊罗马的奴隶为准绳,而常与现实中的凉山彝族社会相联系。

其实 20 世纪 30 年代,郭沫若便注意到凉山“僮罗”与“奴隶”之间的联系。^③他在《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和《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等文章中,更是多次引据《四川省雷马峨屏调查记》所载之凉山彝族“活历史”,^④对当时的“西周封建论”作出反驳。他根据调查报告,先阐释凉山彝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皆处于奴隶社会这一大前提,然后以凉山彝族社会的相应制度对照西周的井田制、分封制和生产劳动者的人身依附情况,并提出三个观点。首先,井田制对土田的分割只是衡量管事者应得报酬的手段,并不意味着土地由国有转为私有。例如,黑彝的奴隶“娃子”倘得主

① 伍婷婷指出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与同时期的古史分期争论有密切关系,为支撑这一观点,她侧重列举郭沫若等人援引凉山彝族社会调查材料进行西周社会性质讨论的例子,未及深入探讨二者互动的源流、发展及影响。参见伍婷婷《20 世纪 50 年代少数民族社会性质调查与史学论争的互动关系》,《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3 年第 5 期。

② 如吕振羽指出:西周分封锡土锡臣,是封建的土地赠予方式;西周的直接生产者“分田而耕”,缴纳“劳役地租、贡物”,从事“徭役”,且不能被任意屠杀,所以不是奴隶而是农奴。参见吕振羽《中国社会史上的奴隶问题》,江明、桂遵义编《吕振羽史论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43、351—354 页;吕振羽《西周时代的中国社会》,江明、桂遵义编《吕振羽史论选集》,第 79—80、84—91 页;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上海不二书店 1936 年版,第 178—225 页。翦伯赞亦认为:周初大规模分封的是封建领主;西周井田制是“封建主义的庄园制经济”。参见翦伯赞《中国史纲》第 1 卷,生活书店 1946 年版,第 278 页。范文澜则以西周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者有一定人身自由并可婚配成家为依据,指出西周主要生产者为封建社会的农奴。参见范文澜《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范文澜全集》第 10 卷《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9 页。

③ 参见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联合书店 1930 年版,第 136 页。

④ 1934—1935 年,中国西部科学院派雷马峨屏调查团前往凉山考察,最终的调查报告《四川省雷马峨屏调查记》在 1935 年 4 月出版。参见常隆庆等《四川省雷马峨屏调查记》,李文海等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少数民族卷》(中),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97—308 页。

人的欢心,亦可婚配并在婚后被“分与田土若干”,但他们对土地房屋等只有使用权,没有私有权。^①其次,以凉山彝族几滩娃子的制度比照周初分封制,则“所谓‘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的内服,一多半是所谓的‘管家娃子’”,至于“所谓‘侯甸男卫邦伯’的外服”则是“酋长族的分家”。^②鉴于此,西周分封制与凉山的几滩娃子制度一样,都是生产奴隶数量增加后,为便于管理奴隶而进行的等级划分,属奴隶社会范畴,而非封建社会制度。最后,因农业奴隶离开土地后难以生存,故与工商业奴隶不同,可以享受一定人身自由。如,被黑彝掳掠的汉人,在驯服后也可获准自由行动。^③

对郭沫若围绕凉山彝族社会而发的论说,持“西周封建论”者罕有直接回应。此后郭沫若对古史分期讨论的关注稍减,直到1950年殷墟“人殉”证据出现,新一轮有关殷周社会性质的争论再度兴起。^④

1949年12月,亲自参与殷墟发掘的董作宾,指出殷墟甲骨文没有“奴隶的痕迹”,矛头直指《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⑤对此,郭沫若没有立即反驳,而是在1950年1月从郭宝钧处获得有关殷代殉人的新证据后,^⑥才借《十批判书》改版之机撰文商榷。郭沫若未讨论殷墟甲骨文有无“奴隶的痕迹”,径以殷墟大规模的殉人遗迹为殷代存在大量奴隶的铁证。^⑦正当郭沫若以“人殉”笃信殷周奴隶社会说“铁案难移”之际,为其提供殷代“殉人”力证的郭宝钧却公开与此事撇清关系。^⑧

正在郭沫若引证“殷代殉人”无果的同时,他在争论中逐渐明晰的“战国封建说”又引发了更多质疑。^⑨以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的发表为开端,围绕周代社会性质的讨论在1951年再次勃发。是年5月,范文澜再次申论“初期封建社会始于西周”之义,并据周代“人殉”数量少于殷代的新材料,主张西周已进入封建社会。^⑩不久,范文澜的助手荣孟源亦以卫墓发掘情形倒推西周殉葬制度,主张周代殉葬之风与殷代迥异。^⑪郭沫若此前频以“人殉”论证殷周两代的奴隶社会性质,而此说欲成立,则两代殉人风气应为一脉。为此,郭沫若不得不就周代“人殉”问题,两次面商郭宝钧,请其提供更多有关周代殉葬情形的考古发掘材料。然而,郭宝钧却以辛村西周墓和汲县、辉县两地战国墓发掘中所见殉葬情形,继续其西周殉葬较殷代“所逊远甚”的前说。^⑫如此,郭沫若为论证殷周奴

① 郭沫若《青铜时代》,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30、433页。

② 郭沫若《十批判书》,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6—37页。

③ 郭沫若《青铜时代》,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432页。

④ 1950年间,郭沫若等人围绕郭宝钧提供的“人殉”材料展开了一系列争论,有关这一段公案,张越已作探讨,本文对张文未尽之处进行补充。参见张越《新中国史学的初建:郭沫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2期。

⑤ 董作宾《殷墟文字甲编自序》,《中国考古学报》1949年第4期。

⑥ 郭沫若《申述一下关于殷代殉人的问题》,《新华月报》1950年第4期。

⑦ 郭沫若《蜥蜴的残梦——〈十批判书〉改版书后》,《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78—82页。

⑧ 郭宝钧《记殷周殉人之史实》,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58—60页。

⑨ 如郭沫若在《读了〈记殷周殉人之史实〉》中指出,由于殷代以后,周秦殉葬之风并未消减,所以“殷周都是奴隶社会,而奴隶社会的告终应该在春秋与战国之交”,参见郭沫若《读了〈记殷周殉人之史实〉》,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集》第57页;在《申述一下关于殷代殉人的问题》中,他明确提出“我自己很想把春秋和战国之交作为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水岭。”参见郭沫若《申述一下关于殷代殉人的问题》,《新华月报》1950年第4期。

⑩ 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新建设》1951年第2期。

⑪ 荣孟源《周代殉葬问题》,《新建设》1951年第6期。

⑫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3—144页。

隶社会而在“人殉”这一新材料方向上做出的努力,又难竟其功。

同年 8 月,王毓铨加入论争。郭沫若曾在“人殉”和“凉山彝族社会”两重证据之外,征引斯巴达“黑劳士”的例子来对照西周奴隶,故王毓铨对“黑劳士”的奴隶身份提出质疑。^①此后,杨向奎、童书业、何高济等人也陆续对“黑劳士”的奴隶身份提出异议。^②

综合上述情状,可以明了郭沫若重视凉山彝族研究的缘故。20 世纪 50 年代初,郭沫若对西周奴隶社会性质的论证主要从“人殉”“黑劳士”与“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三个方面着手。其中,他以“人殉”论证殷周奴隶社会频遭挫折,其有关“黑劳士”性质的主张亦饱受质疑,唯“凉山彝族奴隶社会”较少遭到抨击。这是因为凉山彝族社会的“蓄奴”特征和残酷的奴役关系自近代以来便有公论,并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独创。如,法国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利纳尔(A. Lienard)和法国殖民军一等医官吕真达(A. F. Legender),分别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于实地考察后提出凉山彝族社会盛行奴隶制。此后至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一批著名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也在他们有关彝族社会的调查报告中提到“蓄奴”这一特征。^③当时反对“西周奴隶社会说”者既无新证据来推翻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之说,便只能围绕其他两项进行反驳。面对这种局面,郭沫若不得不在放弃“人殉”证据、补证“黑劳士”是奴隶的同时,更加倚重于“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因此,郭沫若在 1952 年新撰成的《奴隶制时代》中,继续借用彝族的“管家娃子”和“王家娃子”来解读周代的“邦司”和“夷司王臣”的身份。^④

至于郭沫若在众多彝族研究中独对《四川省雷马峨屏调查记》青眼有加,除其当时所能获得的资料有限外,还应与当时学界缺少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彝族社会调查与研究有密切关系。郭氏撰《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等文时,国内外彝族研究虽有上百种,但较少论及彝族社会的阶级组织;在谈及“娃子”时,虽多认其为奴隶,但只是泛指“奴隶”,而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中的“奴隶”。^⑤在这种情况下,记述了大凉山彝族富有奴隶社会色彩的阶级组织和生产方式的《四川省雷马峨屏调查记》显得格外珍贵。

总的来说,因凉山彝族社会与西周社会有诸多相似之处,郭沫若将其引入西周社会性质的讨论,接着又通过论证凉山彝族的奴隶社会性质,类推出西周社会的奴隶社会性质。西周的井田制、分封制以及劳动者有一定人身自由并可拥有土田房屋的情况,是“西周封建论”者质疑郭沫若的“西周奴隶社会”说的重要依据,而凉山彝族社会与西周社会的关键共同点,也恰集中在上述三个方面:凉山彝区存在与西周井田制类似的土田分割行为;凉山彝区的层层奴役体系与西周分封制相似;凉山彝区的劳动者与西周劳动者都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并可拥有一定土田房屋。当郭沫若将解放前的凉山彝区认定为奴隶社会后,西周的分封制、井田制以及享有一定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的生产劳动者,因在另一个“现成的”奴隶社会中出现过,而不能作为判定西周为封建社会的依据,反而成西周奴隶社会说的有力支撑。

① 王毓铨《周代不是奴隶社会》,《新建设》1951 年第 5 期。

② 杨向奎《古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 年第 6 期;童书业《“古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补充》,《文史哲》1956 年第 6 期;何高济《黑劳士问题的再探讨》,《文史哲》1958 年第 1 期。

③ 李绍明、彭文斌《西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李绍明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讲座(二)》,《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 年第 1 期。

④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 3 卷,第 24 页。

⑤ 相关研究综述参见杨小柳《参与式行动:来自凉山彝族地区的发展研究》,民族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30 页;易谋远《20 世纪彝学研究回顾》,崔振宇等主编《中国民族研究年鉴·2002 年卷》,民族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21—167 页。

二、郭沫若与胡庆钧的互动

郭沫若援引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类推西周社会的奴隶性质,虽在逻辑上自洽,但因立说于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大前提下,所以在凉山彝族社会性质有定论之前,不足以平息西周社会性质的争议。在此后的争论中,西周直接生产者的阶级性质成为讨论的焦点,而“有田宅和一定人身自由的劳动者”能否被视为奴隶,遂成问题的关键。^①这一过程中,郭沫若愈益倚重“凉山彝族奴隶社会”这一重论据,而使学界对凉山彝区的奴隶社会性质达成共识,则成当务之急。然而,由于雷马峨屏调查团的主要目标是考察凉山动植矿产和地理气候,而不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专门针对凉山彝族社会的调查,所以《四川省雷马峨屏调查记》全文八个章节中可资郭沫若使用的内容共计不足5000字。并且,该调查报告所描述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中有关“奴隶社会”阶级对立的内容并不十分契合:因将最受剥削压迫的“娃子”划为临时且流动的独立阶层,故该报告所记述的彝族社会内部黑彝、白彝两个固定阶层之间的阶级矛盾并不尖锐,以至于有白彝“皆心满意足,从无反叛之事”这样的表述。^②为此,郭沫若在引用时不得不将汉人“娃子”纳入白彝范畴,并隐去原报告有关黑彝、白彝和睦的内容。

当《四川省雷马峨屏调查记》不敷使用之际,胡庆钧在1952年寄呈的凉山彝族奴隶制报告,对郭沫若而言不啻雪中送炭。1950年上半年,中央政务院向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派出中央民族访问团。得益于此前积累的少数民族研究经验,胡庆钧在总团长刘格平带领的第一分团中担任要职。是年9月,胡庆钧以副队长身份与李平元一起率领第一分团第三队赶赴西昌专区,访问当地彝汉等族人民;三个月后,他被派往凉山彝区的中心地带昭觉县开展摸底工作;次年3月,他带领十余人深入在黑彝统治下的凉山腹心地区;1952年下半年,他前往凉山进行第二次实地考察。^③

在上述调查中,胡庆钧比较完整地了解了彝族中心地带的社会等级结构,并完成了4万字调查报告《大凉山彝族社会》。随后,他在1952年8月15日以无法界定彝族社会中间等级曲诺的性质为由,^④将上述报告寄给了郭沫若。该报告从农业和畜牧业水平、生产工具、社会分工、商品交换等方面入手,得出凉山彝族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近似于奴隶社会前期的结论;并把最受剥削的汉人“娃子”作为“锅庄娃子”和“忌索佐”等纳入白彝范畴,从而构建出一套更为周密的层层奴役体系。相较于《四川省雷马峨屏调查记》,该报告不但材料详尽,而且呈现了一个与“西周奴隶社会说”更相适配的彝族奴隶社会。

① 在1951年以后的争论中,郭沫若有关直接生产者身份的论断继续成为众矢之的。不仅封建论者群起非议,即在“西周奴隶说”内部也不乏异辞。如吴大琨、日知认为“庶人”是“自由民”或“自由农民”;林甘泉则认为,庶民或庶人的地位比奴隶高得多。参见吴大琨《与范文澜同志论划分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标准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6期;日知《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关键何在》,《历史研究》1957年第8期;林甘泉《说庶人的身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古史文存·先秦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2页。

② 常隆庆等《四川省雷马峨屏调查记》,李文海等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少数民族卷》(中),第226—229页。

③ 参见江山《回忆西南民族访问团》,《中国统一战线》1988年第7期;王天玺、张鑫昌主编《中国彝族通史》第4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66页;杜发春《在比较中探求奴隶制社会的规律与特点》,张冠梓主编《学问有道——学部委员访谈录》(下),方志出版社2007年版,第1224、1226页;王文光等《中国西南民族通史》(下),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01页;胡庆钧《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67页。

④ 在有关凉山彝族社会的研究中,曲诺又被写做“曲洛”等;在本文中,统一作“曲诺”。

值得注意的是 胡庆钧在随报告一同寄出的信中 还提出了凉山彝族社会“前期生产力与后期生产关系的矛盾” 即: 从生产力来看 凉山彝族社会近似于早期奴隶制度; 但由生产关系观之 它又“具备奴隶制后期或向封建制过渡的特征”。矛盾的症结在于庞大的中间等级“曲诺”: 在凉山彝区生产力非常落后 且完全无法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社会生产力相匹敌的情况下 却存在曲诺这样一个近似于西欧封建农奴的群体。这个群体几乎占凉山彝族总人口的一半 一方面均与主子建立着“赤裸裸的被占有关系” 另一方面却有一部分人拥有私有财产并向主子租种土地 近似于农奴; 甚至还有少数人拥有土地 上升为奴隶主。^①

由这一“矛盾”来看 胡庆钧似仍在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与凉山彝族封建社会之间徘徊 但以他寄出这份报告的实际行动观之 可能并不尽然。因为自 1951 年以后, “有宅田和一定人身自由的劳动者”的阶级性质 便是西周社会性质争论的重要内容 其中持西周奴隶社会说者认为此类劳动者亦属奴隶 而西周封建论者则主张为封建农奴。曲诺与西周农业生产者有不少相似特征 胡庆钧既选择向主张西周劳动者为奴隶的郭沫若请教曲诺的定性问题 可见其对该问题已有自己的初步判断。

胡庆钧的报告迅速引起郭沫若、范文澜等人的兴趣。^② 其中 郭沫若的反应格外热切。郭氏在给胡庆钧的回信中 不但表露出中国科学院支持他开展进一步研究的强烈意愿 而且还在胡庆钧已有所倾向的基础上 进一步为“前期生产力与后期生产关系的矛盾”指出了解题思路: 首先 社会生产力才是社会性质的决定因素 曲诺虽然绝对数量庞大 但不足以决定彝族的性质; 其次 从凉山彝族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来看 该地生产力十分低下 并不存在形成封建社会的基础;^③ 最后 郭沫若建议胡庆钧 可以通过借鉴斯巴达“黑劳士”来分析曲诺的来源: 如后者也是被当前统治民族所征服的异族 便与“黑劳士”同为奴隶; 至于他们所拥有的私产和自由 便可作黑彝的羁縻之策理解。^④

此后 胡庆钧在郭沫若的启发下 解决了上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完善了《大凉山彝族社会》调查报告 并明确提出了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主张。^⑤ 通过帮助胡庆钧解决凉山彝族社会“前期生产力与后期生产关系的矛盾”这一核心问题 郭沫若得到了一份充分论证凉山彝族奴隶社会性质的重要材料。这份材料不但有力地夯实了“凉山彝族社会是奴隶社会”这一大前提 还通过呈现彝族奴隶社会的“活历史” 提供了比古希腊罗马奴隶社会更现成且细致的标本 为郭沫若解决西周社会性质讨论中诸如井田制、分封制的性质以及“农奴”与“奴隶”等纠葛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胡庆钧的《大凉山彝族社会》很快便被郭沫若吸收进 1953 年改版的《奴隶制时代》一书。早在 1951 年郭沫若便曾将周代的大小臣工比作彝族的“管家娃子” 至接胡氏报告以后 他进一步明确曲诺的性质是奴隶 从而得出西周的大小臣工也是“奴隶”身份的结论。郭氏在“改版书后”中将凉山彝族社会的层层奴役制度与周初“封建”进行更密切的对应 不但以白彝内部因威望而诞生的头人对应西周外服的异姓诸侯 而且将白彝“跟腿”类比西周内服的王朝卿士; 既然白彝头人与“跟腿”

① 胡庆钧《郭沫若与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学术月刊》1983 年第 7 期。

② 杜发春《在比较中探求奴隶制社会的规律与特点》,张冠梓主编《学问有道——学部委员访谈录》(下),第 1226—1227 页; 揣振宇、李彬《胡庆钧先生访谈录》第 428 页。

③ 在此前与王毓铨的讨论中 郭沫若便已提出 奴隶和农夫的绝对数量不能作为社会性质的判定标准 即使一个社会中农奴的数量超过奴隶 也依然可能是奴隶社会。参见郭沫若《关于奴隶与农奴的纠葛》,《新建设》1951 年第 5 期。

④ 胡庆钧《郭沫若与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学术月刊》1983 年第 7 期。

⑤ 胡庆钧《大凉山彝族社会概况》,《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 2 辑,1955 年 10 月。

均不外是可以屠杀贩卖的奴隶,则同理可知周初“封建”也是奴隶性质的等级制度。^①

由郭沫若与胡庆钧的上述互动,可窥知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周社会性质讨论与凉山彝族社会调查之间的交互关系。此一时期,胡庆钧尝试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凉山彝族社会的性质,并从凉山彝族社会提取奴隶社会的要素,帮助郭沫若巩固其立说的大前提;而郭沫若也基于对西周社会性质的认识,为胡庆钧解决“前期生产力与后期生产关系的矛盾”提出解题思路,促使原本徘徊于封建制和奴隶制岔路口的胡庆钧明确了研究方向,进一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对凉山彝族奴隶社会进行更扎实的论证。

在郭沫若与胡庆钧二人的合力下,20世纪50年代初有关西周社会性质的讨论,因凉山彝族社会调查材料的存在而取得切实的新进展。如,此前持“西周封建论”与“西周奴隶社会说”的两派学者,面对西周劳动者同时具备的可被屠杀买卖和享有一定财产、自由的两种特征时,多先质疑不利证据之真伪,或认其为问题的次要方面,然后一以西周劳动者可被随意屠杀买卖而证其为奴隶,一以西周劳动者享有一定财产、自由而证其为农奴;至由凉山彝族的实例,发现该地区劳动者确实兼有被随意屠杀买卖的一面,以及享有一定财产、人身自由的另一面后,重新正视这两种特征在同一社会形态内的并存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对凉山彝族社会乃至西周社会性质作新一轮探讨。

三、凉山彝族社会性质讨论的扩大

1956年,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正式启动。^②胡庆钧不仅参与调查提纲“奴隶社会”部分的修改工作,还以四川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副组长身份,领导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上半年旨在确定凉山彝族社会性质的调查活动。^③伴随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展开,人们对凉山彝族社会等少数民族社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不仅使参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专家学者逐渐形成不同的意见,而且也吸引了更多的历史学者参与凉山彝族社会性质讨论,借社会历史调查的“活材料”,推进古史分期领域有关奴隶制与封建制上下限的争论。

尽管胡庆钧提出“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观点得到郭沫若等人的支持,且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在“凉山彝族奴隶制”认知基础上形成的凉山民主改革方案也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但参与1956—1957年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不少领导和专家,仍对凉山彝区的社会性质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据胡庆钧回忆,在范文澜向杨静仁提出解放前凉山彝族处于封建农奴制最前期的主张后,“四川省省委有人支持范老的意见”;受四川省省委的影响,四川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组长夏康农也一度“从领导的角度开始认为是封建制,但说不出理由”。^④总的来说,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有关凉山彝族社会性质的观点,大致可分为凉山彝族奴隶社会说,凉山彝族封建社会说,凉山彝族周围封

①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第251、252页。

② 中共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刘格平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30页;秦和平《四川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研究——20世纪50年代四川藏区彝区的社会变革》,第64页。

③ 揣振宇、李彬《胡庆钧先生访谈录》,第428—429页;纳日碧力戈等《人类学理论的新格局》,第137页;李绍明口述《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70页。

④ 杜发春《在比较中探求奴隶制社会的规律与特点》,张冠梓主编《学问有道——学部委员访谈录》(下),第1226—1227页。

建、中心奴隶制说,以及凉山彝族原始氏族社会说四类。^①

除民族学界外,许多历史学家也对“凉山彝族社会性质”展开讨论,其中最典型的应是范文澜。范文澜虽在西周社会性质问题上与郭沫若有认识分歧,但同样重视社会调查。^②自1952年胡庆钧向郭沫若递交报告以来,凉山彝族研究便引起了范文澜的兴趣。当时,郭沫若以凉山彝族社会为奴隶社会的标本比照西周,力斥西周封建说之非,其中解放前的凉山彝族社会属于奴隶社会乃其立论的基础。出于对西周社会性质的不同看法,范文澜对凉山彝族社会性质的认定也与郭沫若相分歧。范文澜认为解放前凉山彝族社会处于封建社会前期,但由于缺乏与胡庆钧报告分量相当的材料,所以直到1955年范文澜收到《一个彝族地区底社会经济结构在明清两代迄解放前的发展过程——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之一例》的报告后,才比较明确地发表了对凉山彝族社会性质的不同主张。

上述报告出自刘尧汉之手。刘氏曾在1953年3月受命于翦伯赞等,前往哀牢山调查南诏历史和王室族别,并因此与范文澜有了交集;同年10月,胡庆钧的《大凉山彝族社会概况》发表;此后,刘尧汉亦结合1953年对哀牢山沙坦郎彝族村的实地调查,在1955年5月将《沙村社区研究》修改为3万字的前述报告,寄送范文澜审阅。^③这份报告不但得出中国另一彝族社会在解放前正处于封建社会阶段的结论,而且还在阐述哀牢山沙坦郎彝族村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过程中,使用了与范文澜有关殷周社会形态变革的论述极为契合的调查材料和论证思路,因此很快受到范文澜的重视。1956年,范文澜在《光明日报》以《介绍一篇待字闺中的稿件》为题,不无激动地向公众推荐刘尧汉的哀牢山彝族研究,并大段引用刘尧汉报告中有关沙村社会形态更迭的调查材料。^④

范文澜、刘尧汉二人围绕哀牢山彝族社会的互动,与郭沫若、胡庆钧二人在凉山彝族社会方面的互动遥相呼应,由此可见当时古史分期讨论与少数民族历史调查的紧密关系。在凉山彝族社会材料的帮助下,郭沫若论证西周奴隶社会的思路大致如下:首先根据调查报告阐释凉山彝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皆处于奴隶社会这一大前提;接着以凉山彝族社会为奴隶社会之样本,反推奴隶社会的具体特征;随后,他一面根据所得之奴隶社会诸特征反驳“西周封建论”,一面则以此验证“西周奴隶社会”说。

与之相对,范文澜在引证刘尧汉的哀牢山彝族调查时,也是将它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活样本来比照西周社会。早在《关于〈中国通史简编〉》中,范文澜已经批驳了郭沫若以土地不能私有推断生产工具亦非私有,从而得出周代奴隶社会的结论;同时范文澜还强调,剥削形式的变换才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关键。^⑤至20世纪50年代后半叶,刘尧汉的哀牢山彝族调查也以剥削形式的变换为线索,梳理沙村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演进。根据《诚谕诸儿侄》的记载,刘尧汉指出:普楷高祖时期,因奴隶劳动积极性不高,生产效率低下,所以普姓家族将部分生产资料授予庄奴,改剥削其剩余劳动的全部产品,而沙村亦由是进入封建社会初期的领主经济制。范文澜曾称誉刘文的妙处“正在于所用材料‘几全是取自实地调查,无史籍可稽’”,而《诚谕诸儿侄》正是刘

① 这种分歧在1957年3月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第一次汇报会上有集中体现。参见高哲《有关凉山彝族社会性质的讨论》,《凉山彝族奴隶制》编写组编《凉山彝族社会性质讨论集》,1977年版,第20—21页。

② 范文澜《介绍一篇待字闺中的稿件》,《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12期;有关范文澜对社会调查与传统史籍的结合,参见蔡尚思:《范文澜同志的长于各种结合》,《蔡尚思全集》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29页。

③ 揣振宇等主编《中国民族研究年鉴·2003年卷》,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页。

④ 范文澜《介绍一篇待字闺中的稿件》,《光明日报》1956年5月24日。

⑤ 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新建设》1951年第2期。

尧汉前往哀牢山地区实地调查所得,同时也是后者用以分析哀牢山彝族社会演进的重要资料。由该材料在范文澜的《光明日报》文中被全文引用可知,范文澜对刘氏哀牢山彝族调查的看重,与后者以剥削形式的变换为奴隶制向封建制演进的重要线索不无关系。在刘氏的论述中,劳动者开始得到“份地”等生产资料,被视为沙村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的标志。因西周社会的部分劳动者和凉山彝族的“曲诺”都存在得到少量土地的现象,故由普楷高祖时期的哀牢山彝族社会推及民主改革前的凉山彝族社会乃至西周社会,三者亦应均处封建社会初期。^①

诚如胡庆钧所说,民主改革以前的凉山彝族社会存在“前期生产力与后期生产关系的矛盾”。郭沫若强调生产力对社会形态演进的决定意义,故他与胡庆钧由凉山彝族落后的生产力出发,将其带封建制色彩的劳动者人身依附情况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等政治经济因素,纳入奴隶制范畴作解析。与之相对应的,范文澜强调生产关系的关键作用,故认同刘尧汉以部分劳动者得到土地等生产资料为沙村进入封建社会的起点,以示民主改革以前的凉山彝族社会与西周社会均属封建社会。

除郭、范等人外,其他历史学者也开始运用少数民族社会调查材料探讨西周的社会性质。如1960年,邓子琴分别以凉山彝族社会和羌族社会作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初期的实例,主张西周已进入封建社会。同年8月,杨宽则根据凉山彝族社会和哀牢山彝族社会调查报告指出,西周春秋时代既不是封建领主制社会,也不是“古代东方型”奴隶社会,而是一种因中国幅员辽阔、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等历史条件造成的保存着“村社”残余的中国特色奴隶社会。此后至1963年,马曜、缪鸾和又利用西双版纳傣族的“活材料”比对西周社会制度,指出民主改革以前的西双版纳傣族社会与西周十分相似,因此西周社会同样是一种建立在“封建井田制”上的特殊封建社会形态。^②

余 论

20世纪50年代以前,有关西周社会性质的讨论,大多“不是举希腊、罗马的例子,就是罗列殷墟不完整的材料”,50年代以后,以郭沫若为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尝试借助凉山彝族等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材料来推进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新材料的引入,在遥远的古希腊罗马社会或西欧中世纪封建社会之外,提供了一个现成且具象的“活标本”。因此,这一新材料虽不能终结有关奴隶制和封建制的争论,但仍使学者们得以暂时跳出原先对先秦文本和考古发现的模棱两可的解读,根据“活着”的少数民族社会,具体分析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区别与演进。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涌现的一系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历史材料,使许多参与古史分期讨论的学者直观地认识到:民主改革前的少数民族社会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并不像马恩原著中所描述的那些社会形态那样标准和纯粹;

① 除此之外,刘尧汉在阐释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以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提高作为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而范文澜在1953年改版后的《中国通史简编》中也以周古公为提高劳动者生产积极性而改变土地所有制与剥削方式,来解释殷周社会性质的变革。参见刘尧汉《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一个实例:云南哀牢山彝族沙村底社会经济结构在明清两代至解放前的发展过程》,《历史研究》1958年第3期;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1编,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29页。有关刘尧汉的上述论证材料与思路和范文澜在1953年改版的《中国通史简编》中论证殷周之际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的思路相同这一点,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赵庆云的启发下发现,谨申谢忱。

② 邓子琴《从少数民族社会的考察和研究来看西周社会性质问题》,《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60年第2期;杨宽《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中的三种不同主张——兼论中国奴隶制社会的特点》,《古史新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2—70页;马曜、缪鸾和《从西双版纳看西周》,云南民族学院编《云南民族学院学术论文集1951—1981》,云南民族学院1981年版,第1—139页。

推及中国古代社会 亦是如此。为了进一步阐发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独特之处,有的学者根据凉山彝族社会的调查结果,对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两种社会形态下的生产劳动者应各自具备何种根本特征,同一社会形态下不同阶级的劳动者应各自达到何等数量这类问题进行展开与细化;有的学者通过引证哀牢山彝族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实例,阐释殷周之际发生的社会鼎革;还有的学者综合中国少数民族社会与古代希腊罗马、古代东方各国的奴隶社会特点,阐释富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古代奴隶社会演进过程。

新局面被打开的同时,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首先,无论是持“西周奴隶社会说”的郭沫若等,抑或是持“西周封建论”的范文澜等,均将某少数民族社会预设为自己心目中的西周社会的翻版,并在此预设的指引下,寻找并推重对自己立说有益的少数民族调查材料。这种理论先行的做法,使得不少社会调查在开始之前便已被各派学者预设了结果。于是,一些少数民族社会的性质也和中国古代社会性质一样成为争议未决的问题,而利用少数民族社会调查材料来分析中国古代社会,则被诟病为“拿一个争议未决的问题,比另一个争议未决的问题”。^①其次,在对比研究中,一些学者多着眼于其所同而忽视其所异,不乏“引唐律断汉狱”的误读。最后,我国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社会受外界影响较大,用这样的少数民族社会作为样本来比附中国古代社会,忽视了我国古代多民族统一政权的历史特点。

尽管如此,新中国成立前凉山彝区的奴隶社会性质,不应被视为完全是政治影响下产生的结论。因为近代以来,中外学者对凉山彝族实行“奴隶制”的认定,主要根据该地区普遍且显著的“蓄奴”现象、奴役者对被奴役者的绝对权威、被奴役者的悲惨处境,以及凉山彝族社会落后“未开化”的印象;并且,胡庆钧有关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调查结果,无疑建立在比较深入且扎实的社会调查基础之上。进入 21 世纪后,尽管“无奴论”盛行一时,但李根蟠等人仍援引胡庆钧的凉山彝族社会研究对“无奴论”作出反驳,认为“无奴论”者要讨论中国奴隶社会的有无,便不应绕过胡庆钧的凉山彝族社会研究,“也不可能绕过它”。^②由此可见胡庆钧凉山彝族社会调查与研究的分量。

结合 20 世纪中期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重新审视同时期的古史分期讨论,不仅有助于我们发现古史分期讨论的另一面,也能为我们当今有关社会形态的争议提供一些启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的情况下,我国老一辈马克思史学家不囿于教条,勇于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广泛应用社会人类学调查与研究成果,将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进行理论创造,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前提下,力图呈现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学术研究应先因而后创,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当代史学发展的重要学统,深入挖掘相关史实,并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丰富遗产进行梳理和审视,当能为目前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的建设,提供一些历史智慧与智力支持。

(作者王慧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邮编:100101)

(责任编辑:尹媛萍)

(责任校对:敖凯)

① 束世澂《有关古史分期一些理论问题——与杨宽同志商榷》,《学术月刊》1960 年第 9 期。

② 李根蟠、张剑平《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与古史分期讨论——李根蟠先生访谈录》,《史学理论研究》2002 年第 4 期。

concept until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ompared with terms such as “colonial policy” and “colonial/colonization”, it was not widely used and carried neither a derogatory connotation nor strong criticism.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owever, nationalism became a popular global phenomenon, and the term “colonialism” began to become one of the weapons used by the colonized peoples to criticize colonizers. From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mperialism” originated and spread all over the world, and “colonialism” acted as the core of imperialism.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scholars have been seeking an accurate and separate definition of “colonialism” for decades. Different parties from various cultures offered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mments on the term. By depoliticizing the term “imperialism”, scholars hope to tease out the complicated impact of colonialism in modern history. Despite these efforts, researchers have come to the same conclusion, that is, “colonialism” is still a concept whose origin, spread and development is inseparable from “imperialism”.

Between Political Principles and Institutional Rules: On Lü Simian’s View on Historiography // Xu Guoli

Lü Simian had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mpiling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He made a mor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s with focuses on their genres and contents, and then summarized them as two genres of historical narratives: the *jishi benmo ti* (纪事本末体)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order and disorder” and the *dianzhi ti* (典志体) based on “the system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Although this view had the disadvantage of emphasizing political history, it could record history more comprehensively from both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aspects. Lü Simian’s writing on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critically inherited this tradition. Guided by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ical views, he absorbed the strengths of both genres and invented a new mode of compiling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with synthesis. However, this general history genre also had drawbacks. It became only a history of historical events, ignoring the historical subjectivity of human beings and failed to include biography in the comprehensive compilation of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The Periodiz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Debate and the Ethnographic Survey of Liangshan Yi Society in the 1950s // Wang Huiying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social nature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became the focus of debate on the demarcation of slavery and feudalism in China. Since it was difficult to unify the competing views among scholars, the hope of solving this problem was pinned on the emergence of new historical materials. At this time, there was a need to identify social forms i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minority areas. As a result, the historical and ethnographic surveys of China’s ethnic minorities became gradually connected to the discussion on the periodiz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uo Moruo and Hu Qingjun in the 1950s is the epitome. Guo Moruo introduced Hu Qingjun’s study of Liangshan Yi social research into the discussion of the nature of Western Zhou Dynasty, which inspired the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periodization debate. In turn, this debate also promoted the deepening and widening of Liangshan Yi social research. Probing in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uo and Hu will not only help to understand the progress of the debate on historical periodization influenced by the ethnographic survey, but also to capture the influence of the view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theory of social formations that extended outside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

An Overview of the History of Sino-Foreign Relation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Chines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as a Case Study // Wan Ming

The history of Sino-foreign relations in China has been an emerging discipline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1981, the Chines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SHCFR) was founded, marking the official beginning of this discipline in China. In reviewing the development tract of the discipline, one would argue that CSHCFR has played an instrument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Sino-foreign relations in China during the past four decade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platform has grea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scholarly studies, set up disciplinary systems, and shaped academic conversations. It has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cient China and the world. Based on the previous development, we look forward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is discipline.